

Edmund Leach
LEVI-STRAUSS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埃德蒙·利奇 著
吴琼 译

列维-斯特劳斯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36 号

原文书名：Levi—Strauss

原文作者名：Edmund Leach

Levi—Strauss；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96 by Edmund Leach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维—斯特劳斯/ (英) 利奇 (Leach, B.) 著；吴琼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8-0

I. 列… II. ①利…②吴… III. 斯特劳斯, L. (1908~)—传记 IV. B56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103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7.5 元 (膜)

序

詹姆斯·莱德洛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是非英语世界在这一特殊的学术领域中被同行公认的最杰出的学者。不过……”

埃德蒙·利奇的这本关于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倡导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小册子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些话所确立的语调将贯彻始终。尽管这个语调刚开始还颇为让人不解，但留意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明白最好怎样去读这本书，我们怎样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是在大肆宣扬他的主人公的重要性的时候，利奇也是一方面既表示了他最高的敬意和称许，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含糊其辞的有条件的接受，并且还加上些许嘲讽的口气，极其严肃地对对方进行轻微的滑稽模仿。尽管列维—斯特劳斯被认为——根据该丛书编者的评判——是“现代大师”，但利奇还是拒绝在他身上使用任何类此的称号。他的目的并不是——或者仅仅只是附带地——对列维—斯特劳斯作出一种评述，哪怕是批判性的评述。本书的焦点不在于列维—斯特劳斯这个人所思所想的细枝末节，而在于想确定哪些思想对于结构主义是根本性的，想说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究竟包括些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与众不同，并力图想确

定是不是值得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认识它，那在认识中所获得的东西会不会被证明全都是空忙一场。

因此，利奇想象中的读者并不是新潮知识领袖的可能追随者（并且由于我们现在距离该书的第一版已过了二十五年，那样做也不妨），而是严肃的批判性的学生，甚至有可能是来自另一学派的同仁——或者说，一位古典主义者，他在剑桥皇家学院的餐桌上偶然听说了结构主义，并想通过通俗的英语了解“结构主义”这玩意儿究竟想说什么？结构主义真的是一种严肃的人人都该了解的分析方法吗？如果是这样，那它究竟如何运作？并且，如果——比如说——把它运用于分析希腊神话，那它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吗？利奇显然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许多东西会招致严肃的反驳——经验的、理论的，以及以过分晦涩作为理由的。但是，他也认为对上面的第二个提问的回答应当是“是的”；而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论证这一点入手的，由此进入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

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几乎从一开始就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的名字紧密联系着。这部分地只是一种偶合。利奇是1939年在缅甸山区开始其人类学的实地研究的（这次实地研究结果迫使他加入了那一地区后方的军事武装）。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回到了英国，着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但是1949年，在他刚刚出版他的这一研究成果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人类学名著，即《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提出的完全是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基础的一般理论，另外也对社会结构的形式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利奇实地研究的对象是克钦人（Kachin），在他的论文的论证中，他

们占有极关键的位置。克钦人是那种婚姻制度表现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广泛交换”的两个民族——另一个是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吉尔雅克人(Gilyak)——中的典型例证之一。广泛交换的观点(利奇在本书的第六章对它作了解释)可以说是该论文最为重要的理论观点。而克钦人——对它的论述要比吉尔雅克人多得多——是用来阐述这一观点的主要中介。

利奇这时已经在重新思考他第一次尝试理解的克钦人的社会结构,他似乎当时就被列维—斯特劳斯的优美分析的力量所迷住。但是同时,他也被他所看到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人种学事实犯下的不可原谅的弥天大错激怒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雄心太大。他想包容一切,他对克钦人材料的关心完全受着他更大论题的需要的强烈驱使。例如,他似乎认为,丈夫的亲族集团在克钦人那里的地位要比妻子的亲族集团高,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但是,比此更甚的是,在利奇看来,他似乎毫不在意那些真实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他的模式不会产生任何差异。不过,他只有如此放肆地处理他的人种学资料,才能使他的理论成果——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那个制度真正的运作过程——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利奇第一部真正引起广泛注意的人类学著作(1951年出版)实际上是他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汲取教训之后对他的克钦人资料作的一个批判性的分析,尽管对于后者的错误他的措词十分强烈。并且在他的关于克钦人的主要著作中(1954年),他甚至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风格,他的社会结构概念以及他在建立模式的时候对数学观点的使用等表示了更为强烈的同情。后来,即六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发表

他关于图腾制度和神话学的著作的时候，利奇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分类制度和神话的结构分析。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利奇完全是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利奇的立场总是与众不同，他对社会结构、象征主义和神话研究的贡献（尤其是对圣经神话的分析），还有他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分析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具有原创性的（实际上，《现代大师》丛书中，利奇本人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观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常常发生交锋，就利奇方面来说，至少是常常进行热烈的对话。然而，随着结构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利奇也渐渐被人看作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评述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大部分主要著作一出版，他的评论就会在文学和政治周刊上出现。到六十年代末，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影响的焦虑。1967年，这一年利奇因为他的引起争议的雷斯讲座而在公众当中臭名远播，他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短文。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在为这本书的写作作准备——在这两篇东西中，有些短的段落实际上是相同的——而在那篇评论中，他所关心的就是要证明他的独立性是无庸置疑的：“我已经为我的人类学同事加进了那些告诚的段落”，他写道，“他们中的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如此虔诚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信徒，以致于我再也不能在有关问题上保持任何学术上的不偏不倚”（1967年）。在这本小册子中，利奇十分明确地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信徒”，但是他这么做恰恰违背了“学术上的不偏不倚”。相反，本书真正的力量就有赖于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理想作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描述。

这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它说明了我一开始提到的那种

语调——就在于这里描述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正是利奇的列维—斯特劳斯，是那个既启发过他又让他恼怒的列维—斯特劳斯。当然，诸如此类的事常有发生。任何这类书的作者都必须有所选择，并且那选择必定是个人的。但是，我的意思还不止于此。当利奇着手要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某个观点的时候，他采取的做法就是去说明他，埃德蒙·利奇，可以从中获得何种收益和启示。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例如在第三章，当利奇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分类的观点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结构的同源性的核心思想，这个例子他尽管没有提到，但却是来自他自己的一篇关于英国人的动物分类的论文（1964年）。诚然，那篇论文是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示写的，但是读者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利奇已经同化和使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

这本书有一个地方，利奇描述自己是在“模仿”列维—斯特劳斯。但实际上，他远远不只是这样，因为他个人对他所说明的那种结构主义分析就颇为钟情。他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的方法作了肯定性的说明，另一方面又反复表示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有分歧。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分歧恰恰是关于那一方法的。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奇一直在和列维—斯特劳斯进行对话，这样做是为了主动地向读者亮出自己的观点。那样，他重复说，你将不得不反复思考那个观点，确定自己如何去利用它。

我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利奇已达到了一本导论性的研究著作最为困难的目标。他使读者看到了怎么样才能做得和他一样，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那些思想和方法。并且，对任

何想认真地掌握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的人而言，这可能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执迷于这种策略是有代价的。读者当然不会不加批判地相信利奇，正如利奇也同样劝告他们不要不加批判地相信列维—斯特劳斯。当然，利奇的表述在有些方面显然有着个人的独特风格。他一开始就把列维—斯特劳斯放入与弗雷泽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关系中。这两位学者在英语世界已是（或者说曾是）家喻户晓，其作品也广为传阅，因此利奇这么做的确方便了许多读者；但是，当利奇本人坚持把这两个人作为重要的知识参照点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却只是偶然地才会对他们有兴趣。并且有的时候，利奇是不公正的。他对列维—斯特劳斯极少做实地研究吹毛求疵，并且为了向人说明这一点，他还提到列维—斯特劳斯早期在巴西获得教授职位的举荐人克莱斯汀·博格勒 (Celestin Bouglé)，说这个人曾写过一本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书，但却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在这方面，他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整个学术界都是一帮坐在靠椅上的社会科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舒适地置身于其间。但事实上，这一点是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借来的，后者在十多年前批评博格勒的时候就指出了这样一点（《苦闷的热带》英译本，第56页）。也许最为令人不解的是，在关于亲属关系的那一章，几乎整篇都是激烈的批评语调。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利奇此前就因为这项研究受过类此的刺激，他甚至后悔吸收了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领域的论点——正如他所说，这是人类学领域的“硬果”——于是开始从事神话研究，这是“贪图安逸的人的领地”（利奇，1967年）。看样子，利奇的态度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修订版出版

之后（1967年）变得强硬起来，当时利奇和其他人提出的所有经验性的批评意见都被列维—斯特劳斯当作不会影响他的论证的玩意儿扔在了一边。或者说，也许是利奇已经放弃了他曾完全吸纳的观点，并且他的注意力已经只停留在它们的缺点上。

当这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结构主义正处在学术时尚的中心。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它被列入了《现代大师》系列的首批五种之中——其他的四种是加缪（Albert Camus）、范农（Franz Fano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以及（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格瓦拉（Che Guevara）。因此，利奇显然觉得他应当小心谨慎，就好像他必须表达，他自己的令人兴奋的学术一样。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列维—斯特劳斯基基本的思想上，尤其是他的方法上，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才具有持久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时尚已经过去很久以后还有其价值的原因。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从我一直在说的东西中也能直接看到，那就是：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这本书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有趣的和激励思考的介绍，并且作者把他自己的有些著作结合在一起去理解列维—斯特劳斯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还是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如果把它看作是绝对的参照，那它就是灾难性的，并且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许是它本身的诱惑力，才使得人们这么做，因为它的许多论点的确值得我们反复地强调，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利奇过分夸大了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难度。反正当人们把它看作是绝对的参照的时候，那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学生们接着便会写出糟糕的论文，而且是因为他们会

目 录

序	詹姆斯·莱德洛	(1)
第一章	列维—斯特劳斯其人	(1)
第二章	牡蛎、熏鱼和乳酪	(20)
第三章	人类及其象征	(37)
第四章	神话的结构	(60)
第五章	词与物	(97)
第六章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110)
第七章	“压抑时间的机器”	(129)
参考书目		(139)

第一章

列维—斯特劳斯其人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是非英语世界在这一特殊的学术领域中被同行公认的最杰出的学者。不过，称自己为社会人类学家的学者们通常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已故的詹姆斯·弗雷泽爵士（James Frazer, 1854—1941）即《金枝》一书的作者的类型。弗雷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但他对自己所写的原始民族人们的生活并没有第一手的知识。他想通过对全世界人类文化作具体

的比较，找到关于人类心理本质的基本真理。第二种是英籍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的类型，他曾在遥远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一个偏僻小村庄中独自生活了四年多，其主要学术生涯就是分析研究他在这里获得的调查成果。他的目的是想说明这些异国公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如何“发挥功能”的，说明这些公社的各个成员是如何度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的。他对不同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兴趣比对其基本相似性的兴趣要更为强烈。

目前，英国或美国的大多数称自己为社会人类学家的人，都声称是“功能主义者”；广义地说，他们是马林诺夫斯基风格和传统的人类学家。相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尽管不是弗雷泽风格，但却是弗雷泽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最终关心的是去确立关于“人类心理”而不是关于任何特定社会或社会等级组织的真理。此乃是根本的区别。

马林诺夫斯基在活着的时候就曾享有三种声誉。在普通公众中，他以提倡自由恋爱而驰名。尽管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并没有什么，但他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ers）古怪的性关系行为的解释仍然被认为是近乎色情的。专业同行对他产生的几乎疯狂的热情主要是基于其他的理由，首先是因为他的新颖的实地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现在已被普遍地仿效；其次是因为他的特殊招牌——“功能主义”的教义，这种功能主义的过分简单、机械的社会学推理风格，现在已普遍受到一定程度的轻视。

列维—斯特劳斯的履历与马林诺夫斯基大不相同。从一开始，列维—斯特劳斯就是一个地道的正人君子。除了在

《苦闷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 1955年)中把一些亚马逊女人的裸体照片塞在篇末以外,他就再也没有玩什么哗众取宠的鬼把戏,而马林诺夫斯基在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的专题著作中,就用了《野蛮人的性生活》作篇名。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标准来看,列维—斯特劳斯的实地研究只能算是中等质量的。他的作品,不管是法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有难以理解的显著特点;他的社会学理论把令人迷惑的复杂性和不可一世的博学结合在一起。有些读者甚至会怀疑自己上了信任的当。即便是现在,尽管他已名声显赫,但是,专业同行对他进行批评的人为数大大超过他的信徒。不过,对于他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人们还是没有异议的。列维—斯特劳斯之所以受到称赞,并不单单是因为他思想的新颖,而且也是因为他力求运用这种思想的大胆的独创精神。他对大家都熟知的事实提出了新的观察方法;有趣的是,这种方法的提出并不是实际运用的结果。

上面所说的这种人类学方法与语言学十分相似,它已在许多不同专业的知识界——文学、政治学、古代哲学、神学、艺术等的学生中激起了热情。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对这种方法的前因后果作出一些说明。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宣布一个我个人的声明。

我本人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尽管我已认识到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的理论招牌的局限性,但在我的心目中,我仍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虽然偶然地我也使用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去说明某些特定的文化体系的特征,但是我的基本立场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立场之间的裂隙还是很明显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别在下面的行文中会始终存

在。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和观点，而不是提出个人的评论，但我也不能装作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我关心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而不是他的生活史，但由于他的从1936年开始的作品目录已有了11本书和上百篇之多的论文，这就使得我的工作有点令人生畏。没有一个人能够丝毫不加变形地俯瞰这个景色。而且，由于我将不顾及年代顺序，因此可能会把问题弄得更糟。我将从他书目年代顺序的中间开始，并同时照顾到前后。这种偏爱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判断，因此需要作出解释。

我们可以把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视作是一个三角形，它们都围绕着他的人种学的自传体游记《苦闷的热带》(1955年)向外辐射。接下来，我们可以将此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标上：(1)亲属关系理论，(2)神话的逻辑，(3)原始分类理论。就我个人之见而言，第一个理论既是最早提出的也是价值最低的。不过，我们的作家本人不会同意这个价值判断。列维—斯特劳斯在后期的作品中，常常提到他以前的作品《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1949年)，就好像它是社会人类学史中权威的里程碑。1969年，他又发表了作过实质性修订的英文版本，其中对那些敢于指出他的某些理论与事实不符的英国仰慕者——例如本人——的观点进行了措词激烈的反驳。

显然，这样的著作不可能为我提供一个基点，使我能由此去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态度作出一个同情性的评论。因此，我将把对这本书的评论留到后面再谈。不过，我们还

是需要一个年代学的指南。下面提供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日期。

列维—斯特劳斯年表^[注1]

- 1908 年 出生于比利时。
- 1914—1918 年 与父母一起住在凡尔赛附近（父亲是一位艺术家）。
- 1927—1932 年 巴黎大学的学生，在该校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和哲学教师的任职资格。在此期间，他阅读了“社会学法国学派大师们”——可能有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杜克汉姆（Durkheim）和莫斯（Mauss）等的作品。^[注2]
- 1934 年 经巴黎高等师范总监博格勒（Celestin Bouglé）的举荐，^[注3]得到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职务。
- 1934—1937 年 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注4]在此期间，似乎回过几次法国。曾到巴西内地作从事人种学调查的简短访问。到这段时期结束时，他已经有了大约五个月的实地工作经历。
- 1934 年 阅读罗维（Lowie）的英文著作《原始社会》（1920年）。该书是列维—斯特劳斯阅读的第一本专业性人类学的入门书。罗维的这本书的法文版直到1935年才

- 1936年 由默特劳克斯(E. Metraux)翻译出版。第一篇人类学作品发表。该作品是一篇讨论博罗罗(Bororo)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的论文,共四十五页。
- 1938—1939年 辞去圣保罗大学的职务。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资助,深入到巴西中部作更深入的调查。调查的详情难以说清。最初,列维—斯特劳斯有两位从事不同研究的科学同伴。1938年6月,调查组离开了他们的库亚巴(Cuiaba)基地,于年底到达马德拉(Madeira)河和马沙杜(Machado)河的汇合处。在几乎整个考察期间,他们似乎一直都在路上奔波。列维—斯特劳斯所写的关于纳姆比克瓦拉(Nambikwara)和图皮卡寺赫白(Tupi-kawahib)印第安人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以这次经历为基础的。
- 1939—1940年 在法国军队服役。
- 1941年(春) 取道马提尼克(Martinique)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到达纽约,接受罗维、默特劳克斯和阿斯考立(Max Ascoli)合力为他举荐的在社会研究新校(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职位。
- 1945年 在《言词:纽约语言学集团杂志》发表论文《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 et en anthropologie [该杂志系雅各布逊 (Rowan Jakobson) 及其同仁所创办]。
- 1946—1947 年 任法国驻美国的文化参赞。
- 1948 年 发表《纳姆比克瓦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 [巴黎:《美国社会》(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 1949 年 发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巴黎第一版)。
- 1950 年 任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室主任 (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 1950 年 去孟加拉国的吉大港 (Chittagong) 作简短的实地考察。
- 1952 年 发表《种族与历史》(巴黎)。
- 1953—1960 年 任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常任秘书。
- 1955 年 发表《神话的结构研究》(《美国民俗学杂志》68 卷 270 号第 428—444 页) 和《苦闷的热带》(巴黎)。
- 1958 年 发表《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巴黎)。
- 1959 年 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
- 1960 年 发表《阿斯迪瓦尔人的故事》(La Geste d' Asdiwal) (《高等研究院年鉴》, 1958—1959 年, 宗教科学分册, 巴黎)。